

先秦法家教育思想资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先秦法家教育思想资料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先秦法家教育思想资料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114,000

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7171·710 定价: 0.31元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目 录

(一) 春秋战国时期教育战线上儒法 斗争概述	1
(二) 法家先驱邓析、少正卯的教育 活动资料	20
(三) 法家理论奠基者商鞅的教育思 想资料	32
(四) 战斗的法家理论家荀况的教育 思想资料	60
(五) 先秦法家理论集大成者韩非的 教育思想资料	123
(六) 秦王朝文教变革的有关资料	154

（一）春秋战国时期教育战线 上儒法斗争概述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从奴隶主阶级专政向封建地主阶级专政过渡的大变革时代。一切反动派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新兴地主阶级和它的政治、思想代表法家，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同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及其政治、思想代表儒家，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经过了反复的较量，才取得了建立统一封建国家的历史性的胜利。

“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取决于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个武器去打击谁。”儒法两家教育思想的斗争，必须从当时整个阶级斗争的总根源中寻找线索。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这个时期在教育领域中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服务，是当前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西周奴隶主专政的国家里，教育为奴隶主贵族所独占。文化书籍统统收藏在宫廷中，学校也办在宫廷里，只准奴隶主统治权力的当然继承者王公子孙入学，宫廷中的文化职官就是教师。宫廷以外，没有图书典籍，没有学校，没有教师。西

周奴隶主贵族正是以这种“学在官府”(官学)的文化上的专制主义,维护其反动统治。

奴隶们对于奴隶主阶级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和斗争,到春秋末,终于使奴隶主的统治走到了尽头。奴隶们连绵不断地逃亡和武装暴动,破坏了奴隶制社会借以建立的经济基础井田制,打击了奴隶主贵族专政的礼治,从而促进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形成。这反映在教育上,即“学在官府”局面的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各家私学。所谓私学,在春秋战国时期,既是一种学术派别,又是一种教育团体。各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招收弟子,进行学术传授。

私学,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反过来又为阶级斗争开拓了新的阵地。原来西周官学中所传授的奴隶主贵族文化,即诗、书、礼、乐等,统统为儒家私学所承袭,专门用来打击、破坏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变革,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反动统治。它的代表人物就是孔丘。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处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的新兴地主阶级,自然要求占领教育阵地,为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大喊大叫,为新兴地主阶级实行变法培养人才。此时,郑国邓析、鲁国少正卯所开办的私学,正是适应这一历史潮流的。邓析的私学,摒弃了奴隶主贵族文化,以他著述的《竹刑》为教材,宣传法治思想,教学中充满着对旧制度的批判精神,“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他教育学生要为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而斗争。少正卯的私学,更以他宣传法治路线的坚定性,搞得孔丘的私学门庭

“三盈三虚”，只剩下顽固分子颜渊没走。垂死挣扎的奴隶主阶级决不能容忍地主阶级革新派运用教育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服务，当他们手中尚握有权柄的时候，直接采取了反革命的暴力手段，血腥地加以镇压。公元前 501 到公元前 498 三年间，邓析和少正卯，先后被郑国的执政奴隶主贵族驷黻、鲁国的奴隶制专政维护者孔丘所残杀。儒法两家私学的斗争，从一开始就围绕着两条不同的政治、思想路线而展开，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但是，这个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并不是都从这些流血的事件中得到教训，意识到地主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同时占领教育阵地，把教育牢牢地置于法治路线控制之下。在当时比较先进的诸侯国，如鲁国，就存在这样状况。早在公元前 594 年，鲁国实行了“初税亩”，标志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萌芽，并且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政权已经从鲁公室逐步转移到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代表季氏手中。而这个国家的教育阵地，却让没落奴隶主阶级中两大集团所霸占：一是以孔丘为头子的儒家私学，一是以王骀为头子的道家私学。鲁国本是西周奴隶主大头子周公儿子的封地，礼制统治影响最深，保存的奴隶主文化书籍最多，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孔丘搞私学，正是企图利用这些奴隶主意识形态把鲁国的历史车轮拉向倒转，变鲁国为复辟奴隶制的基地，他曾幻想“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孔门信徒、南宋反动儒家的主要代表朱熹注此则材料说：“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言二国之政俗有美恶，故其变而之道有难易”（《论语集注·雍也》）。由此可见，鲁国的新兴地主阶级要把政治与经济变革推向前进，非扫荡这“先王

之遗风”不可，非与散布礼教的儒家私学斗争不可。可是，季氏没有扶植少正卯所开创的批判旧礼教的战斗性的私学，相反倒让孔丘一度钻进了政权机构，杀害了少正卯，扼杀了新兴地主阶级刚萌芽的教育事业。在一个新兴地主阶级执政的诸侯国里，竟然放任奴隶制度的复辟狂孔丘之流，肆无忌惮地扯起“学而优则仕”的旗号，搜罗奴隶主顽固势力，引诱新兴地主阶级分子，培植复辟奴隶制的死硬派；允许他们大规模地搜集整理散失了的奴隶主贵族反动的文化书籍——诗、书、礼、乐，扩散奴隶主的思想意识，甚至篡改历史，制造复辟舆论，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后果。什么孝呀，悌呀，仁呀，义呀，礼呀，深深地毒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严重地干扰法治路线的推行。《韩非子·五蠹》篇中记述：“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失败）。仲尼（孔丘）问其故（原因），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没人养活）。’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推荐他做官）。”韩非尖锐地指出，所谓父亲的孝子，竟是地主阶级国家的叛臣。依靠这样的军队，谋求国家的兴旺，又怎么可能呢？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正是通过绵延数百年的一系列战争来解决的。战争的胜败，往往直接影响国家的盛衰兴亡。儒家通过私学所散布的奴隶主道德意识，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无异是夭折了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虽然，鲁国是最早施行封建生产方式的国家之一，但终究不能迈开大步，成为一个封建强国，这就是由于政治上改革既不彻底，又没有由法治路线统帅教育。

孔丘的私学，不仅阻碍了鲁国历史发展，而且通过他的门徒，辗转影响各诸侯国的政治改革，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魏国变法失败与孔门子弟关系问题。

公元前424年，魏文侯即位，任用法家李悝为相，在历史上首次进行地主阶级的变法实践。当时法家著名人物吴起、西门豹、乐羊等均在魏国活动，魏国成了战国时期法家的发源地。一时国富兵强，称雄一方。与革命力量集结的同时，儒家信徒、孔门弟子也纷纷在魏国麇集，孔丘的得意门生之一子夏，晚年亦钻入魏国，盘踞西河，开设私学，信徒达三百余人。他们从意识形态及教育方面向新兴地主阶级发动进攻。魏文侯曾经找子夏谈论过音乐。魏文侯向子夏提了一个问题：“我穿起黑色的礼服，恭恭敬敬地听古乐，但仍想打瞌睡，而听郑卫之音（新兴地主阶级的新乐），就不知疲倦。请问，为什么古乐如此沉闷，使人昏昏欲睡，而新乐何以如此婉美悦耳，使人欲罢不能？”子夏的回答，完全操着孔丘的腔调，污蔑新乐是“溺音”，“淫于色而害于德”；吹捧古乐是“德音”，“敬且和”。教训魏文侯要“谨其所好恶”。魏文侯初期不失为一位勇于革新的封建君主，可是，他对于儒生所宣扬的奴隶主贵族的仁义谎言认识不清。他一方面大力起用法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行变法，革奴隶主贵族的命，而另一方面又推崇儒家，拜儒生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为师。对于段干木那种打着“守道不仕”的招牌，行沽名钓誉之实的卑劣行为，不仅不加以揭露，相反地百般尊宠，竟说出“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势，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势不若德贵，财不若义高”（《史记·魏世家》）的一派糊涂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魏文侯对意识形态和教育领域中两个阶级的斗争没有清醒的头脑，最后终于被儒家思想所征服，从信用法家革新派转而起用儒家复辟派。魏文侯以后，儒家路线逐步代替了法家路线，国力逐渐由强变弱。后来的法家集

大成者韩非沉痛地指出：“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韩、赵、魏）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从李悝以及后来吴起在楚国变法活动来看，早期法家变法的共同之点是着力在变革政治，制定刑律，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整顿军队，以法治军，发展农业生产，巩固扩大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这是正确的。因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用革命的暴力夺取和保卫政权问题。但他们很少注意到文化教育领域中尖锐的阶级斗争，而这个斗争的成败，往往反过来影响着政权的巩固与否。“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李悝对于反动儒生利用儒学破坏变法的反革命活动，不仅不予以制止，反而认为他们有仁德，理所当然。当魏文侯决定用魏成子，即一个以十分之九的俸禄来豢养儒生的复辟派为相时，变法的支持者翟璜愤愤不平，他历数自己在魏文侯变法的紧要关头，怎样推荐了吴起、西门豹、乐羊、李悝等五位著名法家人物，难道说功劳少于魏成子吗？此时的李悝理应支持翟璜对魏成子进行斗争。但是，李悝不仅不反击，反而在翟璜面前大大地赞美了魏成子一番，说“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十分之九）在外（结交儒生）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魏文侯）皆师之。子（翟璜）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史记·魏世家》），自愿放下斗争武器让出权力。据历史记载，李悝曾师事子夏，这或许就是儒家的仁义说教在李悝身上留下的痕迹。

历史的发展决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先进的阶级总是要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历史进入战国中期,齐、秦等国又出现了变法高潮。齐国地处东方,封建经济发生早,发展快。齐威王时(公元前356——321),任用邹忌为相,聘请慎到为顾问,起用著名军事家孙臆为军师,很快地形成了“诸侯东面朝齐”的大好形势。在同一时期,与齐威王变法相辉映的是,地处西方的秦国,秦孝公信用商鞅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改革。

商鞅是一位杰出的法家人物,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性。他总结了战国初期东方各国变法失败的历史教训,在变革政治、经济的同时,对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等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了革命尝试,对于儒家利用私学这块教育阵地,腐蚀新兴的地主阶级,阻挠法治路线的执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第一次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制定了一条与其政治和经济变革相适应的教育路线。在商鞅所处的时代,“耕”与“战”是完成封建变革的两大关键问题,“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教育,是为政治和经济服务的,在当时,它必须为发展农业生产,巩固扩大封建经济关系,壮大军事实力,武装保卫新兴的地主政权而作出贡献。商鞅正是从这个基点上,提出了他的教育主张。商鞅一再强调治国的根本是“令民归心于农”(同上书),因此教育的根本任务也就是教“民归心于农”。人民能安心于农业生产,也就能乐于打仗。可是儒家私学却教人们

摆脱生产劳动,反对暴力革命,死啃《诗》、《书》,游说诸侯,求官食禄。商鞅尖锐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君主,果真让这批儒生及其他游说之士,凭着他们那套复古的“巧言虚道”,就能得到高官厚禄,那么,即使是有识的豪杰之士,也难免要弃农战。学《诗》《书》,四出游说,以显身求荣,结果必然是“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养成了纵欲放荡,好逸恶劳,奉承拍马,伪装虚骄的恶劣作风。这样的国家,又怎么能够和诸侯争雄呢?商鞅愤慨地痛斥儒家私学是“贫国弱兵之教”!他从富国强兵的原则出发,主张禁止《诗》《书》《礼》《乐》的传播,代之以法教。建议秦孝公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抛弃仁义说教;堵死“学而优则仕”的各个孔穴,公开宣布“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商君书·垦令》),即不能让人从结交权臣、游说君侯的途径,获得封爵和官职;实行“贱游学之人”、“显耕战之士”、“富贵之民必出于兵”的选拔人才的路线,即要凭向国家交纳粮食多少,军功大小,分别给予不同的爵位及官职;禁止儒生入秦,“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干净利落地剥夺了儒家进行私学活动的一切权利。这一条为法治服务的崭新的教育路线,商鞅称之为“壹教”。他要通过“壹教”的执行,在地主阶级中形成新风尚,使他们喜农乐战,“闻战而相贺”,为发展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而出力。商鞅对于破坏“壹教”的反动分子,采取了镇压手段。经过了一系列的艰苦斗争,秦国的新兴地主阶级才开始把教育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成为打击奴隶主阶级及儒生们的复辟活动的锐利武器。据史籍记载,商鞅抛弃儒家的礼义仁爱,“修赏罚以辅壹教”,行之二年,秦俗大变。突出的一点,就是人们从奴隶主礼教的桎梏下挣脱出来,力于农,勇于战,富有进取精神。商鞅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变法成功,

为后来秦始皇“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奠定了基础。荀况在战国末期，目睹东方各诸侯国变法先后遭受挫折，军事上的胜利，也往往不能巩固，提出了“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怎样才能使地主阶级专政“坚凝”起来呢？历史赋予法家的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难题。荀况在实地参观了秦国以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荀子·大略》）。这是说，只有当政治路线同时统帅了教育，使教育设施、风俗习惯、人们的思想倾向都和政治革命的方向一致时，才能使新兴的地主阶级国家“坚凝”起来。“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商鞅所以在秦国变法取得胜利，正在于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内挖掘了旧地基，这就是商鞅对历史所作出的贡献。但是商鞅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当秦孝公一死，奴隶主复辟势力凶狠地反扑过来，他就不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反击，结果被奴隶主贵族车裂而惨死。商鞅死后，东方各国先后出现了一股反法反秦的逆流。曾经被地主阶级革新派打击和奚落得狼狽不堪的儒生，又神气起来，东窜西跳，污蔑诽谤秦国“不识礼义”，是“虎狼”之国，重新操起以礼义治国的老调。在这股复辟逆流中，充当急先锋的是孔门的信徒孟轲。在教育上倒退复辟的一个典型事件，则是齐国稷下学宫的出现。在教育理论上的反动，则是《学记》的出笼。

孟轲曾经先后两次到过齐国，但两次境遇截然不同。孟轲第一次到齐国，正是齐威王立志进行封建变革的时候，对孟轲这套王道仁政的虚伪而反动的学说并不感兴趣，送了“兼金”一百镒，把他打发走了。孟轲第二次到齐国的时候，齐威王已

死，齐宣王在位。“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他在国都临淄西门（稷门）造起了高门大屋，开设了一个学宫，学宫大门向各个学派开放，赐各家头面人物七十六人为“上大夫”爵位，专叫他们“不治而议论”，鼓励各家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阵地上搞绝对自由化。一个到处碰壁的，孟轲，此时竟被齐宣王尊为“卿相”，让他广招门徒，出行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十分阔绰。在已经历过变法、由新兴地主阶级执政的国家里，特别是商鞅在秦国进行了“壹教”实践，禁止了与变法唱对台戏的儒家私学活动以后，齐宣王不是继续和发展齐威王不用儒的正确路线，把稷下学宫办成法家批判儒家的战场，在意识形态和教育领域里，对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相反，采取了对各家一律“尊宠”的方针，实际上给奴隶主阶级复辟活动留下了地盘。春秋战国时期的阶级斗争历史证明，随着奴隶主阶级的经济基础日益瓦解，政治特权日益丧失，奴隶主复辟势力就愈益抓住教育（私学），进行垂死挣扎。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基本上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变法形式，所以，一个君主的政治思想倾向如何，直接影响这一国的政治实践，儒家看准了这一点，拚死利用私学，从两方面向地主阶级进攻。一方面，通过著书立说，在社会上广为散布奴隶主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道德、思想意识，企图用奴隶主阶级的世界观，征服人心，培植复辟奴隶制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私学，培植复辟党羽，游说诸侯，力图左右其思想政治路线，以达到扑灭新兴地主阶级变法运动的罪恶目的。稷下学宫正是在这两方面为儒家所利用。查一查被齐宣王赐予“上大夫”的名单中，虽然有法家人物，但儒家和道家却占了优势。孟轲正是在齐宣王跟前肆无忌惮地进

行“仁政”说教，抛出了一个全面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鼓吹法先王，一切向后倒退。在教育上则公开对抗商鞅的“更礼以教百姓”，反对地主阶级教育革命，疯狂叫嚣要复辟奴隶制的“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稷下学宫，可以说是儒家在教育上搞复辟的一个突破口，他们曾在那里拟立了一个《弟子职》，儒家学派的第一个成文学规，规定学生的职责是，按照奴隶主阶级的礼仪，恭敬地侍候先生起床、盥洗、吃饭、睡觉，成为一个“温柔孝悌、毋骄恃力”（《管子·弟子职》）的没落奴隶主的殉葬品。

《学记》作者是谁，历史上虽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就其思想内容来分析，则是奴隶主复辟势力利用儒家私学搞复辟的反革命经验总结。和孟轲唱的是一个调子。它美化三代奴隶制学制，鼓吹以诗书礼乐为教，达到“克己复礼”“化民成俗”。一时，复辟旧教育的舆论甚嚣尘上。旧教育是产生新贵族的一种土壤，后来齐鲁之所以成为儒生们盘踞的老巢，反对建立中央集权封建统一国家的桥头堡，这决不是偶然的。

齐宣王确实被这阵妖风刮得东倒西歪，站不稳脚跟，在思想意识和教育领域里，完全放弃阵地。他给新兴地主阶级的凶恶敌人，提供讲台，任凭他们放毒。商鞅曾经总结过的一条治国的经验，说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其君愾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情而不农”（《商君书·农战》），那么这个国家也就快完了。因为众说纷云，无法坚持一条正确的路线。齐国正是这样，特别在齐宣王以后，情况更糟，齐湣王被燕兵击败死在莒地，齐王建降秦，齐国人怨恨他们的君主，“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西汉著名法家桑弘羊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正确地指出：“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弱燕

攻齐，长驱至临淄，湣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禽于秦，与之俱虏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盐铁论·论儒》）。

一个曾经与秦国相匹敌的东方大国，由于不坚持在意识形态和教育领域内的地主阶级专政，走向这样的结局，确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三

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奴隶主贵族可以杀害商鞅，但改变不了商鞅变法所体现的历史发展的方向。正如韩非所说：“商君死，……秦法未败也”。商鞅以他变法的坚决性，为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战国末期，历史已经向封建地主阶级提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的任务。新兴地主阶级越是接近全面胜利，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越是猖獗，斗争更加复杂、尖锐。面临两个阶级决战的时刻，怎样正确地从路线斗争高度总结地主阶级变法运动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经验，以指导地主阶级革命向统一全国的目标胜利进军，就成为迫切的课题。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总结教育领域中革命与反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这个总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荀子和韩非挑起了时代的重任，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

春秋以来教育领域内的斗争历史，集中向地主阶级提出了一个严峻而又现实的问题，即如何对待各派的私学，特别是儒家私学的问题。东方各国地主阶级变法收效甚少，追索原因，差不多都无例外地和儒家私学有关。实践证明，在变法过